

女「性」道德及其同難者： 茅盾小說《虹》對於娜拉困境的 另類書寫

邵 悅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提 要

茅盾創作於1929年的長篇小說《虹》，講述了女主人公梅行素經由讀書、婚姻、工作、革命而不斷成長的故事。學界多將前期的梅行素視為典型的個人主義者，批評其後期轉向左翼革命的過程不夠清晰。本文試圖從兩則對梅行素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本切入，即易卜生的劇作《娜拉》和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藉此討論梅行素如何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理解並體認新女性的精神困境。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分析梅行素與不同女性人物以及革命黨人的交往互動，試圖呈現出梅行素從個人走向群體的漫長而又複雜的過程，證明其左轉至革命陣營並非一蹴而就的激情使然，而是在深刻認識到自身的真正困境之後選擇的精神出路。

關鍵詞：茅盾 《虹》 娜拉 貞操 左翼文學

女「性」道德及其同難者： 茅盾小說《虹》對於娜拉困境的 另類書寫

邵悅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一、前言

茅盾（1896-1981）的長篇小說《虹》（1930），講述了女主人公梅行素經由讀書、婚姻、工作、革命而不斷成長的故事，梅行素也是他筆下首位「性格有發展」的人物，遵循著一種「合於生活規律的有階段的逐漸的」而非跳躍式的發展。^❶階段性的發展變化，賦予了梅行素因時制變的波動性，即其座右銘所謂：「將來的事，將來再說；現在有路，現在先走。」^❷《虹》歷來最受矚目的是其「革命加戀愛」的部分，研究者多聚焦於梅行素與初戀情人韋玉、丈夫柳遇春、暗戀對象梁剛夫之間的互動，尤其肯定了有關梅、柳二人的情欲書寫。^❸由於學

❶ 茅盾：《茅盾全集》第35卷（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頁468。

❷ 茅盾：《茅盾全集（小說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34。

❸ 陳建華高度肯定了針對梅女士與柳遇春之間的情感書寫，認為描寫梅的性意識覺醒及其對柳的性行為的厭惡較為「真切細緻」，其中主人公的「女性」和「母性」味比較濃，由此可見茅盾身上似乎出現了「自然主義」的回潮。陳建華：〈「時代女性」、歷史意識與「革命」小說的開啟形式：茅盾早期小說《虹》讀解〉，收入徐志偉、張永峰編：《「左翼文學」研究讀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47。

界多將前期的梅行素視為典型的個人主義者，^④認為梅行素自從參演《娜拉》起，便開始提倡女權，並信奉「個人主義傾向的易卜生主義」；^⑤對於梁剛夫這一革命者，有學者提出其面對女色不為所動的近乎完美的形象是一種人物塑造上的失敗，因為那不是一個活生生的豐富真實的男人，梅行素是在其批評刺激下賭氣好強式地參與革命工作，這一轉變過程也就缺乏革命邏輯本身的說服力。^⑥因此，梅行素後期意識形態的「左轉」則被批評為過程不夠清晰，未能展現其心理變化，導致整部小說顯得虎頭蛇尾。為了完善梅行素投身革命的內在邏輯，暗戀革命黨人梁剛夫一事往往被解讀為梅行素轉向的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目前有兩處鮮人留意的細節需要被重新審視。其一，是小說的原初構想與最終成書之間的結構性差異。茅盾本想從「五四」一路寫到1927年的反革命政變，進而在姊妹篇小說《霞》中續寫梅行素在白色恐怖時期的經歷；可惜《霞》未能成書，《虹》也止筆於「五卅」。^⑦《虹》的「未完成」導致了主線情節的戛然而止，梅行素對於革命的體認自然也未完成，小說在篇幅上更側重於五四新女性的覺醒而非左翼革命。其二，閱讀經驗對梅行素的自我解放而言至關重要，小說中出現的書報刊物及其背後的性別議題很難被某種思想或主義所界定。

本文關注的是五四新女性梅行素如何在「知」與「行」的拉扯之間砥礪前行，這一人物的成長主要體現在從個人到群體的發見與體認，逐漸意識到個人的苦悶源自一種經由結構性的歷史形塑而深植於女性群體之中的道德困境，即書中所謂「數千年來女子的心」。（茅盾，1984a：10）本文將從兩則對早期梅

④ 夏志清從近代知識分子寓言的角度去分析《虹》，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梅女士是「一個典型的易卜生個人主義的信徒」。詳參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15。

⑤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94-95。

⑥ 蘇敏逸：〈「個人」作為「革命歷史」的象徵：論茅盾的《虹》〉，《華文文學》第6期（2006年6月），頁25。

⑦ 茅盾：《茅盾全集》第35卷，頁468-471。

行素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本切入，一是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的三幕戲劇《娜拉》（*Et dukkehjem*, 1879）（後世多譯為《傀儡之家》或《玩偶之家》，下文皆沿用舊稱《娜拉》），二為周作人（1885-1967）翻譯的日本作家與謝野晶子（1878-1942）的〈貞操論〉（貞操は道德以上に尊貴である，1915）。這兩則文本關於現代浪漫愛、婚姻與貞操道德的討論，刺激了梅行素對於性別問題的多向度反思，意識到「女『性』道德」對於女性自身的精神網羅。在此基礎上，本文將考察梅行素與書中其他女性人物的互動模式，分析其如何發現女性「同難者」的群體性存在，進而重新考察她從內陸來到上海之後，如何受梁剛夫、黃因明這樣的革命黨人所吸引，從而對個人與社會產生了全新的認識。綜上，本文希望能夠呈現小說《虹》難以被某一種思想、主義、情感模式所圈定的複雜面向，從而理解茅盾以女性個人的視角書寫革命運動的核心訴求。

二、貞操道德與《娜拉》的出路問題

（一）從主角「娜拉」到配角「林敦夫人」

中學時期的梅行素曾參與排演過易卜生的劇作《娜拉》，但她扮演的不是女主角，而是較少人關注的配角林敦夫人。小說以戲中戲的形式，將一齣挪威的劇作搬演至成都的女校，這一設定呼應了「娜拉」在五四中國的迅速走紅，即《新青年》在1918年6月推出「易卜生專號」後，易卜生的劇作及思想便在知識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引發了娜拉出走問題的激烈論爭。

胡適（1891-1962）於「易卜生專號」發表了〈易卜生主義〉（1918）一文，介紹寫實主義作為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揭露了家庭和社會以法律、宗教、道德之名所犯下的惡行。^⑧ 次年，胡適於《新青年》發表獨幕劇〈終身大事〉（1919），結尾處，娜拉式的女主人公田亞梅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反對自由戀

⑧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6期（1918年6月），頁489-507。

愛的父母之家，坐上了男朋友陳先生的汽車。⁹1923年，魯迅（1881-1936）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文藝會講上發表演說〈娜拉走後怎樣〉，直言沒有錢的娜拉「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藉此呼籲男女平均分配、勢力相等的必要性。¹⁰在魯迅的短篇小說〈傷逝〉（1925）中，女主人公子君好不容易實現了自由的戀愛與結合，卻被柴米油鹽耗盡了愛情。較之離開娘家後又步入夫家的〈終身大事〉，〈傷逝〉的內核更接近於《娜拉》所欲揭露的現代婚姻的殘酷性與陰暗面。不過，魯迅最為在意的還是女性就業難所造成的物質困境，孟悅（1956-）和戴錦華（1959-）認為魯迅的觀點無形中在意識形態上忽略、限定、封閉了「女性性別群體精神自我的出路」，易卜生筆下的理想婦女在精神立場上也不過是「剛剛背離了玩物階段的非男性」。¹¹孟、戴二人指出了五四以降之娜拉論述的局限性在於，始終未能發見或直面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精神鎖鏈，遂難以在女性出路的問題上提供新的可能。

在茅盾作於1920-30年代的文章中，有不少與《娜拉》或娜拉式困境直接相關，在他看來，嚴峻的除了麵包問題，還有性道德的不公。在〈戀愛與貞操的關係〉（1921）一文中，茅盾指出西方社會依舊存在貞操這一「只為制裁女子侵犯男子的獨有權而設」的名詞，只不過用權利義務來包裝罷了。¹²〈離婚與道德問題〉（1922）一文藉由《娜拉》在中國輿論場上的發酵，批判了傳統婚姻觀對中國婦女的壓迫，同時指出現代西方的離婚法依舊以「偏頗的兩性道德觀」為靈魂，西方男女之間仍存在「懸殊甚遠的道德標準」。¹³〈《娜拉》的糾紛〉（1935）引述了當年的一則新聞，稱某婦女因參演《娜拉》而被校方開除，茅盾藉此指出中國社會對於娜拉的恐懼和壓迫，自五四以來就從未改變過。¹⁴依茅盾

⁹ 胡適：〈遊戲的喜劇：終身大事〉，《新青年》第3期（1919年3月），頁311-319。

¹⁰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68。

¹¹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51-52。

¹²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四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252。

¹³ 同前註，頁328。

¹⁴ 微明：〈《娜拉》的糾紛〉，《漫畫生活》第7期（1935年3月），頁5。

所見，娜拉之所以被視為危險份子，不僅因其主動拋棄了賢妻良母的身分，還在於她的出走徹底否定了家庭婦女實現人格獨立、獲取社會地位的可能。換言之，茅盾認為，婦女只有參與社會勞動才有可能獲得社會地位，畢竟職業婦女想要獲取與其勞動價值相符的社會地位已是萬分艱難。此外，茅盾還指出新女性對於《娜拉》的理解不足，她們普遍聚焦於「純粹的經濟問題」而忽視了更中心的問題，即婦女的經濟獨立並不能直接提升其社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觀點及其在小說中設置的娜拉式困境，倒與郭沫若（1892-1978）在〈娜拉的答案〉（1942）中指出婦女解放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關聯性並以革命作為娜拉之根本出路的觀點遙相契合。¹⁵

如果將這齣戲中戲簡化為女主人公之個人主義覺醒的契機，那就意味著梅行素對於「娜拉出走」有著充分的體認。但茅盾與胡適、魯迅等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把原本聚焦於娜拉的鎂光燈轉投給了林敦夫人，使梅行素通過飾演這一配角而改變其對性、愛、婚的舊有觀點，預備獻身給更偉大的前程。

梅行素也承認，她所受的五四思潮確實有關個人主義、自我權利、自由發展，但俄國作家托爾斯泰（1828-1910）的思想也使他保留著一些「對於人和人融和地相處的渴望」，並憧憬著合理的生活。（茅盾，1984a：209）梅行素最先注意的也不是易卜生，而是韋玉介紹的托爾斯泰的小說及其無抵抗主義哲學。韋玉將托爾斯泰的哲學理解為在戀愛中從對方的幸福上打算而非自私自利地佔有，由此決定放棄他與梅行素的愛情，不因自己的肺病而坑害心愛之人的未來；但與此同時，韋玉又服從了家中包辦的婚姻，即便坑害了未來的妻子，他也相信真正的劊子手是包辦者而非自己，反正「刀是不能自己動的」。（茅盾，1984a：26）韋玉試圖在托爾斯泰的思想中找到某種高尚的哲學來為自己背棄愛情的行為背書，從而解除痛苦，在梅行素看來其本質依然是妥協懦弱。雖然梅行素對無抵抗主義頗為反感，但她承認韋玉的思想的確因此而改變：「在畏怯退縮的表皮下，他（按：韋玉）有從前所沒有的勇敢和決心，在不近人情的冷冰冰內，他燃

¹⁵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收入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頁215-221。

燒著犧牲自己以謀別人的幸福的熱情。」（茅盾，1984a：28）梅行素所認識的托爾斯泰主義，是一種對立於庸俗個人主義的利他主義，這也為她走近林敦夫人一角奠定了基礎。

梅行素的好友徐綺君，倒是「三句話裡總有兩個『易卜生』」，其實她的狀態更像一個易卜生的信徒。（茅盾，1984a：30）由於五四時期充斥著新的書報，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色各樣甚至互相衝突的思想往往同見於一本雜誌，被一同鼓吹。（茅盾，1984a：53）梅、徐二人酷愛「『新』字排行模樣的雜誌」，只是對於那些西方大師唯有極模糊的觀念，甚至還有不少誤會，但不妨礙她們相信「托爾斯泰和易卜生都是新的，因而也一定都是好的。」（茅盾，1984a：53）與其說梅行素是何人或何主義的信徒，不如說她是一個典型的求「新」若渴的知識青年。和眾多五四青年一樣，梅行素也崇拜過勇敢出走的娜拉，直到近距離接觸了林敦夫人這一角色，才對《娜拉》產生了不同的理解。

劇中的林敦夫人是娜拉的同窗好友，曾因家境困難而與情人柯士達分手，轉頭嫁給了富商林敦先生，可惜丈夫去世後沒留下什麼遺產，林敦夫人只能拼命工作以供養病母弱弟。後來，母親去世，弟弟也長大成人，林敦夫人卻在如釋重負的同時失去了奮鬥的動力，於是拜託娜拉的丈夫替她找一份工作，未曾想及這份工作擠走了柯士達，二人見面後重燃愛火，但即便有再婚的打算，林敦夫人也不願放棄那份工作。小說中的女校學生們普遍不齒林敦夫人「戀愛了又反悔」、「做了寡婦又再嫁」的不貞行徑，生怕飾演這一角色會累及清譽，唯有梅行素力排眾議地出演並高讚林敦夫人為劇中「最好」的人物：

她是不受戀愛支配的女子。她第一次拋開了柯士達去和林敦結婚，就因為林敦有錢，可以養活她的母親和妹妹；¹⁶ 她是為了母親和妹妹的緣故犧牲

¹⁶ 在易卜生的原劇中，林敦夫人只有兩個弟弟而無姊妹。小說《虹》中所述之「母親和妹妹」中的「妹妹」，應為茅盾筆誤。詳參易卜生著、潘家洵譯：《易卜生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129。

了自己。她第二次再嫁給柯士達，又是為了要救娜拉。她就是這樣一個勇敢而有決斷的人！（茅盾，1984a：44）

梅行素眼中的勇敢決斷，恰恰是女學生們眼中的道德瑕疵。在易卜生的筆下，身為好友的娜拉也不理解林敦夫人當初為何不選擇嫁給愛情。¹⁷ 在娜拉看來，愛情是婚姻的充分必要條件；而對林敦夫人來說，生存才是第一要義：「人總得活下去，因此我就變得這麼自私，只會想自己的事情」。¹⁸ 雖如此說，林敦夫人又並非自私自利，她是為了家人才嫁給富商，喪偶之後也獨自挑起了照顧家人的重擔，到了無人需要自己的時候，反迷失了生活的方向。考慮到女性就業艱難，林敦夫人並未出於感情而將得來不易的工作崗位相讓給柯士達，而是坦率地宣示這份工作對她而言同樣重要，藉此保障其經濟獨立與社會尊嚴。

胡適在分析易卜生筆下的個人與社會之關係時，使用的還不是「個人主義」這一概念，而是引自易卜生書信中的「為我主義」，即「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¹⁹ 在胡適的進一步解讀中，為我主義並非完全的利己，而是先救出自己，將自己鑄造成器從而有益於社會，其本質是一種完全積極且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林敦夫人兩次以性、愛、婚為條件去和男子交易，都以利人為目的，如果說那是個人主義，那麼她最大的個人利益便是在溫飽的基礎上求取獨立之尊嚴，而非精緻的利己。

而扮演林敦夫人的梅行素，彼時正隱隱恐懼著即將而來的包辦婚姻，雖然她在思想和言語上視「性」道德如無物，在身體上卻不是完全的無所畏懼。梅行素怨恨那些高叫著打破舊禮教的知識分子，包括學校的老師，為何都不曾教授過什麼應對的方法。幸而易卜生的《娜拉》為梅行素提供了一條別樣的出路，她決定效仿林敦夫人，用自己的婚姻來替父親還債，至少做了一樁有益於人的事。在林敦夫人的參照之下，梅行素頓覺娜拉在離家出走的勇敢之餘，也曾有欲施美人計

¹⁷ 同前註。

¹⁸ 同前註，頁 130。

¹⁹ 胡適：〈「易卜生主義」〉，頁 502-503。

卻不敢逾越雷池的怯懦，而這份怯懦似乎使得最後奪門而出的勇敢在梅行素心中大打折扣：

當一切路都走不通的時候，娜拉曾經想靠自己的女性美去討點便宜，她裝出許多柔情蜜意的舉動，打算向藍醫生秘密借錢，但當她的逗情的遊戲將要變成嚴重的事件，她又退縮了，她全心靈地意識到自己是「女性」，雖然為了救人，還是不能將「性」作為交換條件。反之，林敦夫人卻截然不同；她兩次為了別人將「性」作為交換條件，毫不感到困難，她是忘記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茅盾，1984a：45）

梅行素認為，驚覺自己被丈夫當作玩物並不是什麼神奇的大發現，那不過是女子在幾千年來日復一日的集體性遭遇罷了。但這一歷史性壓迫所造成的精神困境，卻難以憑藉娜拉式的出走而徹底擺脫。梅行素所謂幾千年來女子的心，指的就是將性道德的自律作為最高利益，從而在行動中自我掣肘，在現實中錯失種種救人或自救的機會。梅行素從娜拉的身上看到了「性」如何被塑造為女性原罪從而有效地牽制了她的能動性。在既想犧牲美色又臨陣退縮的娜拉身上，梅行素顯然投射了自己在不同時期的苦悶心境，尤其到了婚後，在夫妻關係上受挫的丈夫尚能訴諸土娼的性撫慰，梅行素卻受制於一種擔心自己隨時要墮落的女性意識，令其倍感無力。

如果說良母賢妻的圈套早已被梅行素識破，那麼小說安排她和徐綺君這對摯友在戀愛觀上產生分歧，目的在於進一步討論西風東漸以來，新文化思潮如何在召喚女性自主意識的同時，又使其落入戀愛至上的浪漫圈套。同為包辦婚姻的批判者，徐綺君較之梅行素更擔心戀愛的「犧牲」，而犧牲一詞本身就賦予愛情以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性，梅行素卻表示自己「沒有戀愛可以犧牲」，換言之，她認為包辦婚姻所犧牲的是個人自主的未來，而非一個抽象的戀愛概念。（茅盾，1984a：48）聽到這番話，徐綺君的第一反應是替韋玉感到難過，認為他的感情被辜負，卻不知韋玉與梅行素早就在是否抵抗父母之命的問題上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兩端，他二人的戀愛也不再是交互的情感，而是一樁已成定局的悲劇。

如果將梅行素放置在中國女權論述的歷史脈絡下，應將其與晚清民初的廢纏足、興女學、五四以降之新女性追求經濟權、工作權、參政權的路線進行區分。梅行素更著眼於現代婚戀對婦女群體的新型網羅，這一困境與「娜拉走後怎樣」並行不悖，前者是後者的底色，其壓迫性和嚴峻性卻易被遮蔽。小說有趣地為娜拉們提供了墮落、回家之外的其它選項，也就是黃夫人這一人物所謂的「尼姑庵」和「棺材」，尼姑庵意味著逃避世事，棺材則代表自我了斷，顯然都不是梅行素所願意的。梅行素思索的是，婦女在肉身脫離了父/夫家之後，精神上該往何處去？

（二）貞操與潔癖

梅行素在婚前還受到《新青年》上登載的〈貞操論〉（1918）一文影響，頓覺不能將處女之身隨便給與可憎的丈夫，因此推翻了先前欲以「性」操縱婚姻生活的計畫。（茅盾，1984a：57）

〈貞操論〉的作者是日本作家與謝野晶子，原文的標題為「貞操是道德以上的尊貴」，意思是作者視貞操為「趣味」、「信仰」、「潔癖」，因為貞操高於道德，遂不能強迫他人。²⁰ 與謝野晶子強調的是貞操觀念的私人性，並從貞操和道德的定義切入，聚焦於兩者的實踐關係，再基於現代婚姻之必然性已然動搖的社會現實，論證道德意義上的貞操與現代社會的格格不入。與謝野晶子的觀點，一言以蔽之，可謂貞操非道德。周作人盛讚與謝野晶子是極進步、極自由、極真實、極平正的大婦人，只是考慮到中國婦女尚未關注到自身問題，故此次譯介的目的在於供「極少數覺了的男子」研究和參考。²¹ 胡適曾受該文啟發，於《新青年》發表〈貞操問題〉（1918）以抨擊長久以來的貞操論，但他也嚴正聲明，自己並非鼓吹男子嫖妓納妾而女子便該偷漢多夫，胡適是將兩者視作同一性質的差錯，強調貞操是男女交互的道德。²² 同年八月，魯迅於《新青年》發表〈我之

²⁰ 與謝野晶子著、周作人譯：〈貞操論〉，《新青年》第5期（1918年5月），頁386-394。

²¹ 同前註，頁386-387。

²² 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第1期（1918年7月），頁5-14。

節烈觀》（1918），揭露男子吹捧節烈的目的在於將性道德的責任全部推卸給女子，從而放心地去誘惑她們。²³ 不論是周作人，還是胡適和魯迅，他們批判的都是男子，試圖召喚並引發認同的也是男子，而女性讀者尤其是所謂貞節烈婦，並不在其對話對象的範圍之內。值得注意的是 1920 年代的「新性道德」論爭，以章錫琛（1889-1969）先後任《婦女雜誌》和《新女性》兩份刊物主編期間的言論及其引發的論戰為代表。過往針對新性道德的研究已經將攻防雙方的論述立場做了詳實的整理和分析，許慧琦在〈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2008）分析了這一場新性道德論爭及其招致的認為其鼓吹多妻 / 夫之性關係的非難。²⁴ 許慧琦指出，這一場後五四的論爭是對於五四時期的貞操議題的承接和發展，二者的論述重點及其對性道德的認知有所不同，以章錫琛為代表的新性道德建構者特別強調新性道德與戀愛自由的相互依附性，試圖拓寬性關係的自由行動範疇。從所謂夫婦家庭內部的貞操發展至所有兩性關係中的道德爭議，足見 1920 年代對於現代浪漫愛之情欲突破及其困境的複雜認識。

茅盾作為〈貞操論〉的讀者之一，他的性別身分完全符合周作人所期待的受眾類型。然而，並不在期待範圍內的女性讀者，例如梅行素，便產生了意料之外的誤讀，她從〈貞操論〉中捕捉到了「潔癖」這一關鍵詞，由此激發出了頑強的「處女的自尊心」。（茅盾，1984a：57）這一設定或許只是無心的一筆，卻意外地觸碰到了男性知識分子與女性讀者之間的「性別階序（sexual hierarchy）」²⁵ 所造成的觀念落差，前者往往從中汲取了強有力的批判論述，後者的閱讀則因應自身處境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變種。

²³ 唐俟：〈我之節烈觀〉，《新青年》第 2 期（1918 年 8 月），頁 92-101。

²⁴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6 期（2008 年 12 月），頁 29-92。（DOI:10.6352/mhwomen.200812.0029）

²⁵ 筆者所指的是「性別階序（sexual hierarchy）」，即在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被頻繁使用的概念，用來指代社會文化對於不同性相所賦予的不同位置及其存在的壓迫關係，這是構成「性政治」內涵的關鍵；另外，「中央大學性 / 別研究室」曾對「性別」這一概念進行理論性的反思，用「性 / 別」的斜槓來納入階級、種族、年齡、身體等社會差異的關連性。

與謝野晶子的文章固然是爲了賦予讀者以抵抗傳統道德的勇氣，但對於即將在新婚之夜接受一樁非自願性行爲的梅行素而言，該文卻喚出了一種植根於傳統貞操觀念的性焦慮。從新思想的藍圖走入舊道德的殘餘，梅行素從積極反抗的語詞中獲取的不是批判的力量，而是她所不齒的負面情感。婚後不久，梅行素再次想起了這篇〈貞操論〉，由於處女的身分不再，加上發現了丈夫有嫖娼的慣習，梅行素再度萌生了以「性」爲手段的復仇衝動，卻又一次受制於「知」與「行」的鴻溝而無法付諸實現。梅行素終於遭遇到娜拉式的美人計困境，原來她在潛意識中對所謂的貞潔如此看重。在知易行難的背後，是思想的先鋒性與其身體的歷史慣性之間在拉扯，本質上仍受制於社會思潮內部一些未完成的新舊道德之間的博弈。

（三）何謂女性？何謂母性？

茅盾在《虹》的開篇寫到，梅行素多年來惟一的目的是「克制自己的濃郁的女性和更濃郁的母性」。（茅盾，1984a：6）學者陳建華將此句中的女性和母性理解爲女性的特質、爲母的天性，他認爲茅盾力圖抽掉梅行素的女性和母性從而體現其「神性」，使得小說最終呈現出「女性的革命化」而非「革命的女性化」。²⁶ 陳建華認爲小說創造了梅行素的「神性」，因爲她要克服自己的「女性」和「母性」從而獻身給更偉大的前程。換言之，其所謂「神性」是一種非人性或曰非自然的人性。陳建華提出，《虹》的「女性」和「母性」論述中存在一種悖論：即戀愛和婚姻也屬於女性與母性的範疇，作爲新女性的梅行素對於婚戀自由的追求，豈不就是對於女／母性的追求嗎？陳建華進而批評了小說描寫梅行素對於女／母性的克服，本身就呈現出一種「不自然」。²⁷

究竟小說中屢屢出現的女性一詞是什麼意思？母性又具體指向什麼性質？如何理解「濃郁」乃至「更濃郁」的程度遞進？陳建華所謂的自然與否又是基於什

²⁶ 詳參陳建華：〈「時代女性」、歷史意識與「革命」小說的開放形式——茅盾早期小說《虹》讀解〉，頁 247-248。

²⁷ 同前註，頁 244-248。

麼樣的界定標準？本文認為，陳建華的論述代表了一種較為普遍的「性別本質主義」²⁸，故其批評也體現出一種相對僵硬的兩性想像，將性、愛、婚包括生育繁衍判定為女性生理的本能、先天存在的欲望，任何形式的抗拒都會構成其所批評的不自然或曰非女性。

如果仔細留意小說中的男性人物，就會發現茅盾在描寫幾位男性配角時，也時常強調他們具有「女性」的氣質，例如韋玉是一位「女性太多的少年」，他那一雙「溫和的女性的眼睛」常常飽含淚水；（茅盾，1984a：22-23）再譬如李無忌是一位「高身材的女性的人」，直到投身政治事業後才褪去了從前「皇皇然不知所求的幽悒的氣色」，並增添了一些「得到了什麼確信了什麼的神情裝點成不很壞的風采」。（茅盾，1984a：229）我們是否就依此判定茅盾在本質化女性與男性的差異呢？難道《虹》也參與形塑了男強女弱的性別刻板印象嗎？

實則，茅盾所謂男性身上的「『女性』性」，並不是指既定成見中的陰柔之美，而是一種懦弱、脆弱、茫然的消極狀態，站在其對立面的也不是所謂男性陽剛，而是強大、篤定、確信的精神樣貌；前者植根於一種服從性的無抵抗的道德規訓，後者則意味著對前者的否定與掙脫。《虹》所批判的並非女性的生理特質及其情欲表達的自由，而是包裝成男女天然屬性的社會文化建構。

茅盾在 1920 年代初期發表了大量關於女子解放運動的文章，明確反對女子天生脆弱一類的性別本質化判定，強調女性蒙受的塵污源自歷史，女性的脆弱必然對應著男性的強暴和誘惑，即便是所謂解放且覺悟了的新女性也容易陷入享樂主義的迷陣，即在經濟的壓迫下屈服於對繁華的欽慕和性的引誘。²⁹ 他尤其推崇瑞典女性主義者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關於家庭和兩性問題的研究，提出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下，應儘快創立兩性之間的新道德，即愛倫凱所謂「貞操的新定義」；傳統性道德，也就是性的道德標準及其教條主義的結果造成了男女道德責任之不同，使得中國婦女長久處於被屈服的地位，對當下的婦女解放事業而

²⁸ Uma Narayan, *Essence of culture and a sense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vol. 13, no. 2, Apr. 1998), pp. 86-106.

²⁹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四集）》，頁 308。

言仍是一大阻礙。³⁰

茅盾並不認為現代婦女能夠在「戀愛神聖」與「母性操勞」中實現自我，甚至相當諷刺地評價稱：「女子解放的意義，在中國，就是發見戀愛！」³¹ 在〈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觀〉（1925）一文中，茅盾介紹了新性道德的主張者試圖利用「戀愛神聖」的觀念反對並取代傳統的貞操觀，鼓吹戀愛之極端自由論，提倡爲了戀愛「無論什麼皆當犧牲，只有爲了戀愛而犧牲別的，不能爲了別而犧牲戀愛。」³² 在茅盾看來，這一觀念嚴重阻礙了女子解放事業，壓倒了她們求學、做人、服務社會的理想以至於忘了自身。³³ 在〈現代女子的苦悶問題〉（1927）一文中，茅盾認為即使國家社會認識到爲妻爲母者的價值，也未必就此承認其地位，「正如資本家雖然從勞動者的血汗上認識勞動者的價值，然而未嘗肯承認勞動者的地位。」³⁴

當然，作者與其筆下的人物的觀點未必有所對應，況且梅行素作爲一個時刻處在變動之中的發展型人物，我們很難以其當下的某個觀點去框定她的立場。在梅行素心中，性道德一度重如泰山，一度又輕如鴻毛，此種反復無常呈現出新女性在新舊觀念的交替之際試圖平穩過渡爲社會新人的艱難，她們之中更普遍的可能就是梅行素這樣，在現實與理想之間來回擺盪。此種擺盪和拉扯不應該被冠以「不自然」，相反的，梅行素正是在轉型時代直面新與舊、多與寡、張與弛的複雜情感，毅然地對向來被視爲「自然」的性別範式作出了掙扎與反抗。

起初，在丈夫柳遇春的性攻勢下，梅行素原本凜然不可侵犯的心情遭到了瓦解，眼看就要在情欲的迷眩中淪爲無抵抗者。初夜的經驗傷害了梅行素的自尊心，使其承認先前從林敦夫人一角中習得的全然是空想，一觸及現實就幻滅。尤其當柳遇春投其所好地討好梅行素，甚至讓她感受到了幾分真心，梅行素才迅速

³⁰ 同前註，頁 121-124。

³¹ 同前註，頁 323。

³²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五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 262。

³³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四集）》，頁 323。

³⁴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五集）》，頁 308。

產生一種警覺：

她覺得這是些無形的韌絲，漸漸地要將她的破壁飛去的心纏住。可是她又無法解脫這些韌絲的包圍。她是個女子。她有數千年來傳統的女性的缺點：易為感情所動。她很明白地認識這缺點，但是擺脫不開，克制不下，她有什麼辦法呢！（茅盾，1984a：77）

小說中梅行素所遭遇的不是暗無天日的封建牢籠，而是一夫一妻的現代專偶制婚姻，丈夫柳遇春也並非「根深蒂固的傳統」；³⁵ 而是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的「並非一無是處」³⁶，只是一個庸俗的「普通男人」。³⁷ 柳遇春在梅行素的影響下也有了思想上的改變，甚至主動替梅行素購買新書，從一個「封建地主的思想」搖身一變成爲「資本主義下的商人」，本質上還是爲了換取妻子的性服務。（茅盾，1984a：90）

茅盾筆下的婚姻，是《娜拉》在中西不同脈絡下的結合，即封建包辦與現代資本主義的雙重疊加，雖爲父母之命，但幸好是豐衣足食，丈夫雖然嫖娼，卻號稱知錯能改，此地未嘗不是好人家。爲此，梅行素力圖克服「女性」和「母性」，不光是爲了抗拒社會大環境所造成的在發見自我的同時又忘記自我的戀愛圈套，還指向家中的歲月靜好所滋養出來的貪圖安逸的怠惰，以及妄想丈夫會支持自己遠走高飛的僥倖。

³⁵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115。

³⁶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頁 94。

³⁷ 蘇敏逸的研究已經注意到了梅行素並不滿足於五四所宣揚的新思潮而是嚮往著偉大的前程。蘇敏逸認爲，茅盾這樣的情節安排是以共產黨的史觀反省五四思潮的缺失，並開啟 1920 年代富有階級意識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這與茅盾在 1931 年對五四運動的檢討所採取的觀點是一致的。詳參蘇敏逸：〈「個人」作為「革命歷史」的象徵：論茅盾的《虹》〉，頁 19、24。

三、從自我到他人：發現女性「同難者」

茅盾曾評價 1920 年代的中國婦女思想，從最左派到最右派，中間至少相差百年，像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北京等地已經都市化，但內地多是一世紀前的老樣子。³⁸ 梅行素從相對保守的內陸來到群潮爭鳴的東南沿海，始終是一個曲高和寡的獨行者，對於群眾的力量始終保持觀望，即便在參加革命後，也常有不合群的表現。與此同時，梅行素又迫切地嚮往著同道中人的出現，她總是遺憾「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她，也沒有一個人肯用心來了解她」。（茅盾，1984a：234）而梅行素所抱怨且恐懼的孤獨是由什麼造成的呢？若從梅行素的角度上看，她既被身邊的女性所猜忌、憎恨，又被周遭的男性所追求、糾纏。若從梅行素與他人的實際交往上看，梅行素其實很少像批判他人一樣真正嚴肅地審視自己，而該小說的複雜性正在於它在梅行素身上同樣安放著嫉妒、猜忌與憎厭的「女性根性」，這種隱隱然的筆法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由於小說採取了倒敘的敘述方式，故而本文在這一節將依照梅行素的成長路線而非書中人物的出場順序，逐一分析她與黃夫人、陳女士、女教員們以及文太太的相處之道。

（一）黃夫人

黃夫人是梅行素在成都時期的鄰居，她畢業於女子師範，丈夫是高等師範的教員。黃夫人因丈夫與妹妹黃因明偷情而對婚姻絕望，欲投奔婦孺救濟所，或到女修道院、尼庵出家，也鬧過自殺。當黃夫人向梅行素傾吐苦水時，梅行素的態度是暴躁、不耐煩甚至相當憎惡。一方面，她與黃夫人在價值觀念上相互對立，梅行素深信主觀的力量可以轉換客觀的環境，而黃夫人悲觀地認定所有事物都「像黃梅天的菜蔬一定得變壞」。（茅盾，1984a：79）另一方面，黃夫人怯懦

³⁸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五集）》，頁 176。

的個性讓梅行素想起了自己的初戀，由於韋玉主動向包辦婚姻低頭而葬送了他二人的愛情。

梅行素怒斥了黃夫人的消極避世，並給出兩種解決方案：一是到社會上謀一份獨立的生活，二是像黃先生那樣也另找愛人，與之對抗。黃夫人表示事情沒有那樣簡單，自己懦弱的根源是丈夫既不放她離開，又不承認婚外情，黃夫人若執意離婚出走，便要背負「缺德」、「薄情」、「心活」等污名。（茅盾，1984a：80）為清譽起見，女子只能想到出家和尋死這兩條出路。雖然梅行素在同黃夫人爭執的當下仍堅稱自己絕不會重蹈數千年來女子的覆轍，但此話一出，她忽然感到無邊的黑暗和陰冷正從四面包圍過來「埋葬了她們倆」：

梅女士簡直是怒罵了；她的脹熱的頭腦已經把自己近來的煩悶和黃夫人的問題混雜在一處，成為整體，她自己也不很明白這樣的忿激是為了黃夫人呢，還是為了自己；她好像是一個失敗的革命者為要撐住著自己不陷入於悲觀和消沈，便不得不盛氣斥罵那些愁眉淚眼的同難者；然而她的心卻也在暗中流血了。（茅盾，1984a：80）

在這一段獨白中，梅行素第一次以「革命者」自喻，卻是一個「失敗的革命者」。曾幾何時，與丈夫吵架後回娘家的梅行素，也曾對著老父親發誓自己將來可以去做尼姑。（茅盾，1984a：65）面對黃夫人這樣一經受挫折就頹靡不振的革命同志，梅行素的斥罵其實也是為了警醒那個在思想解放之路上一度躊躇不前的自己。當然，黃夫人算不上梅行素的同志，甚至做摯友都很勉強，但她在性、愛、婚上的進退維谷喚起了梅行素關於自身處境的共鳴，瞬間發見了自己與黃夫人的「同難者」連結。這一發見使得梅行素逐漸意識到黃夫人也是一個有感覺、有脾氣的人，她的消極避世並非個性上的缺陷，而是遺傳自數千年來女子之弱點。（茅盾，1984a：84）

（二）陳女士

梅行素在暫居重慶城外的江北治本公學期間，認識了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教員

陳女士。陳女士愛好議論他人的婚戀八卦，似乎對男女關係頗有經驗，但在思想上卻視獨身主義為高尚理想，譬如說她在小說中找不到真正的獨身主義者，乾脆再也不讀小說。（茅盾，1984a：104）陳女士還對著梅行素詛咒自己所從事的教育生活，但在即將躋身教員行列的梅行素看來，陳女士並不是在訴說教育行業的艱苦，而是對未來的同業者進行一種「預防營業競爭的消極的恫嚇」。（茅盾，1984a：106）面對陳女士的滔滔不絕，梅女士向來是微笑點頭，耐著性子敷衍，裝作心悅誠服的樣子，甚至從中體會到了人與人之間那些不可言說的「陰私的創痕」：

似乎每個人的主張都不是突然來的，都有一些特殊的經驗背景。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像外貌那樣簡單，每個人都有些不願別人知道的秘密，而別人的話語卻又常常會撞在這些陰私的創痕上，似乎是故意的撩撥。（茅盾，1984a：104）

梅行素似乎真的從陳女士那令人厭煩的老成卓見中窺見了可恨之人的可憐之處，由此推斷而知原來每個人都有隱密的負面經驗，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就產生於彼此陰私的互撞，而群體也就在這樣的交互模式中不斷分化，從而使梅行素感到恐懼和厭惡。

不過，梅行素這一人物的複雜性在於，她雖然從自己與不同人物的相處中總結了一些社會經驗和人生道理，似乎把他人剖析得透徹無比，但就像丈八的燈台，在照見了別人的地方往往照不見自己。譬如梅行素形容陳女士是「深於世故的老處女」或曰「嘴碎的老處女」，實則梅行素也或多或少地內化了性道德的審判邏輯，只不過她走到了貞節牌坊的對立面，將性經驗上的貧瘠和性生活上的匱乏作為攻擊女性思想的利器。到了瀘州師範附屬小學任教後，梅行素遭逢了更加複雜的人事關係，上述問題也就更為明顯地浮現出來。

（三）瀘師附小的女教員們

梅行素一入職瀘師附小，就受到以張逸芳為中心的女教師團體的排擠，而男

同事要麼是過分的愛慕，要麼就顯得輕薄不尊重。如此一來，梅行素感覺每天像打仗一般滿身傷痕，同事們的笑聲像利劍一般刺入她的耳朵，人人都對自己充滿了嫉妒、鄙棄和猜忌，這些人也都成爲了她「想像的敵人」。（茅盾，1984a：123）

起初，梅行素以爲自己無法融入女同事們的交際圈，是因爲大部分女教員都畢業於重慶二女師；但又發現女同事們對同樣來自成都的徐綺君又很友善。其次，梅行素發現女教員團體內部也充斥著攻擊嘲諷和攀比妒忌，連帶著這所學校都根本是一處「不適宜的環境」。（茅盾，1984a：125）雖然校長和教員們自詡爲新教育派，然而內部派系鬥爭不斷，在性別問題上看似開明實則保守。然而，小說並非自始至終都徹底擁護梅行素的批判，偶爾也會有一些旁逸斜出的拂逆之言。譬如徐綺君曾鄭重地提醒過梅行素，當前的社會還沒替理想主義者準備一個「理想的地方」以及人和人相處的「理想的關係」，梅行素眼中盡是別人的問題，確實容易忽視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太過「驕傲尖刻」的形象。（茅盾，1984a：125-126）當然，我們不必跟隨徐綺君一起懷疑梅行素是「神經過敏」，但也不妨先跳出梅行素的個人立場，重新審視這些被她視爲「委瑣，卑鄙，而又怯弱」的人物。

當梅行素在酒桌上被男同事們起哄之際，女教員趙佩珊在一旁幸災樂禍地低頭微笑，隨著梅行素的憤然離席，男同事們轉頭就開起了趙佩珊的玩笑；儘管梅行素的第一反應是去搭救趙佩珊，但趙佩珊卻擔心梅行素會把當晚的事情透露給小報記者，讓她沒有面目再做這所學校的教員。對於趙佩珊基於傳統貞操道德所產生的憂慮，梅行素完全不能理解，甚至頗爲豪爽地反問：「這一點也要怕？」果然，當夜之事被傳出去後，成爲了當地的教育頑固派攻擊他們這些新教育派的利刃，梅行素作爲最大的嫌疑人，一時間成爲全校的公敵。這一場牽涉到性騷擾、校外激進與保守之戰、校內各派系鬥爭的桃色謠言所給予梅行素的最大教訓，最終落在了個人與群體的不可調和之上。梅行素只感受到群體的傾擠和冷淡，無有團結的熱情，因此絕不相信一個內鬥不斷的群體可以達成所謂「彼此一體，利害一致」的集體觀念，好比男子在玩弄女子時也許會覺得彼此一體，弄不到手「就是兩體了」。（茅盾，1984a：166）

按照茅盾埋下的伏筆，梅行素將在省長家做家庭教師的期間，同楊小姐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以至於對方拔槍相向。考慮到這些情節都沒有付諸紙上，我們對於梅行素在這一階段的成長變化也不得而知。唯獨可以確定的是，梅行素一定會持續地發現這些女性道德的同難者，就像看到女教員張逸芳深受桃色非議的困擾，梅行素也表示過感同身受，並願意伸出援手。梅行素還曾計劃把已故之舊情人韋玉的遺孀和小孩從成都接出來，「替她們籌畫一條生活的路，替小孩子找學校」。（茅盾，1984a：128）然而，梅行素是一個活在當下的「現在主義」者，向來不作未來的規劃，於是那些感同身受與伸出援手也都沒有了下文。

（四）文太太

與梅行素結伴離川赴滬的文太太，是一個肥短的中年婦人，小說描寫她雖不怎樣難看，但嘴角向下而顯得面容陰慘。文太太是社會新舊交替的標誌，衣服是上等布料，樣式卻很老舊；一雙纏足已被解放，但難免畸形。（茅盾，1984a：7）對照梅行素的狹長天足，文太太那雙不合時宜的解放腳，更顯出一種「伶仃孤苦的神氣」。（茅盾，1984a：4）既然孤苦，何來神氣？這一組看似矛盾的形容，恰恰反映出文太太在婦女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她涉足政壇卻不受尊重的尷尬處境。

爲了爭取參政權，文太太曾帶領姊妹們到省長公署請願、直闖省議會，卻遭人背後惡評爲「母老虎發邪」，得知此事的文太太「下意識」地感覺這是自己過去的「黑影」玷污了原本光明的前程。（茅盾，1984a：7）所謂黑影，指的是當年關於她年輕守寡的流言蜚語；而所謂「下意識」，表示文太太已經出離了憤怒，她不去怪罪那些口出惡言者，也毫不懷疑妨礙自己前途的還有別的原因，而是徑直召喚出了過去守寡時所受的精神創傷，並再次被它回溯性地挫折了自己的銳氣。文太太由此相信了女子清白對其立足社會的必要性，所以小說形容她和許多反對女子參政權的人們「實在是同志」。（茅盾，1984a：7）僅憑道聽塗說，文太太就判定梅行素是省長的情婦。不料，梅行素也反唇相譏，希望對方將心比心，不要將年輕時所受的謠言轉嫁到他人身上。恰如纏足之不可逆，文太太記憶中的創傷一經梅行素的揭開，便又像迴旋鏢一樣重新打中了自己。

小說安排梅行素擁有無可疵議的美麗，而文太太信仰無可疵議的清白，同樣是無可疵議，二者之間卻充滿張力。正如文太太不由分說地給梅行素扣上了高官情婦的帽子，梅行素一開始就厭惡對方那「奇惡的頭髮臭」，即便岸邊的土匪朝輪船上放槍，她都不願同文太太一起到密閉的船艙避險，甘冒槍林彈雨。梅行素那高度文明的潔癖是生理性也是精神性的，她憎惡文太太「風度太庸俗」、「眼光只有寸半長」、「貌似清高而實鄙俗」以及「渾沌到極點的女權思想」，可就是這樣一位毫無可取之處的女子，卻令梅行素「半意識」地同自己比較起來，進而回想起了一些舊相識。（茅盾，1984a：13）

所謂舊相識，指的是梅行素在省長家做家教時認識的女性，我們不難想像她們是怎樣一種緊張的關係，即小說頻繁提及的數千年的依賴生活所形成的女性的嫉妒的根性。小說頻繁地使用「根性」一詞，並不是為了強調什麼抽象的人性本質，恰恰相反，茅盾筆下的「根性」源自生活，而且是數千年來女子依賴且受制於男子的生活。梅行素對於文太太的鄙夷，也並不針對特定的某個人或某類人，而是指向在性道德的異化之下，女性之間圍繞「性」展開的負面情感模式，例如嫉妒、仇恨、惡性競爭。

閒談時論及省長的五房姨太太，梅行素極盡嘲諷之能事，而文太太卻相當突兀地問了一句：「聽說（按：姨太太）也有極醜的，是真的麼？」（茅盾，1984a：10）梅行素援引了〈莊子·秋水〉篇中的寓言故事，自詡為鸕鷀，那些嫉恨者則是生怕被奪食的鴟，言下之意，省長這樣位高權重的男子在梅行素心中也不過是腐爛的老鼠；鴟鳥的狹小格局，恰如梅行素譏諷那些「願為英雄妾，不作俗人妻」的姨太太們，即使容貌再美，也是天字第一號的醜人。但文太太並不理解，至少並不在意梅行素的嘲諷，她還沉浸在「姨太太」與「醜人」之間令人匪夷所思的連結，小說描寫她受到了異樣的感觸而陷入沉默：「忽然仰後倒在塌上，把兩手遮住了臉……」雖未點明，但梅行素似乎感覺到守寡多年的文太太產生了某種遺憾的孤寂之情，她對那些姨太太們或許懷有艷羨，尤其是那些傳聞中的其貌不揚者更加勾起了文太太心中隱密的惆悵。值得揣摩的是，小說側寫了此時此刻的梅行素正好在端詳文太太那「臃腫的身材」與「不自然的小腳」，儘管文太太遮住了自己的臉。（茅盾，1984a：10）

作為女子參政論者的代表，文太太本應肩負婦女解放之重任，但她自己仍受制於性別秩序的壓迫，從政生涯不僅沒能助其脫離貞操道德的苦海，反而刺激她走向了傳統衛道士的極端。梅行素並非不能理解文太太出於周遭現實的考量而做出妥協，但她不齒其在他人身上複製曾經施於己身的言語暴力，妄圖藉此來獲得某種高人一等的的神氣。不過，梅行素也有她自己的神氣，只是不易被讀者所察覺，甚至梅行素自己也未必意識到她與文太太並非只有思想新舊與學識深淺的差異。在女性遭受的共時性的集體污名的譜系之中，梅行素位於金字塔的高處，她年輕、美麗、有知識、飽受異性的追捧；而居於底端的文太太已經上了年紀，她並不好看、學識淺薄、獨身而孤寂。小說中反覆描寫文太太不識趣地對著梅行素噓寒問暖、滔滔不絕，而梅行素總是想方設法地逃避，就像擺脫文太太那傳統髮髻的臭味。梅行素有著一頭俐落的短髮，雖然曾受保守份子的非議，但畢竟時代在發展，如今的她已經可以昂然立於甲板之上眺望象徵著未來的上海，而文太太這樣半新不舊的人物，卻注定要返回內陸的四川。

四、野貓與幽靈：革命者及其誘惑

當梅行素回顧自己在四川的生活時，她將其總結為「顛倒錯亂」。所謂錯亂，即社會與自我永遠不能恰好地吻合，個人永遠無法與環境和解，每換一個環境，依舊是重蹈覆轍。到了上海之後，梅行素意識到「五四」只教會了她一些斷爛的名詞，例如光明的生活、愉快的人生、舊禮教、打倒偶像、反抗、走出家庭到社會去，而這些名詞根本無法應對上海這一複雜廣闊的新環境。（茅盾，1984a：226）

最令梅行素費解的是梁剛夫、黃因明這兩位左翼革命黨人。梅行素自詡從四川到上海的一路上經歷豐富，可是從「顛沛豪華」中鑽出來的她卻完全無法理解梁剛夫、黃因明等人的行為動機。此地的左翼革命黨人，何以有那樣的虔誠？什麼東西驅使他們熱心拼命？自己又是為什麼被梁剛夫、黃因明所吸引？這一股令梅行素百思不得其解的不可抗力，恰恰是我們理解其思想左傾的關鍵，而梁剛夫和黃因明二人作為這股不可抗力的形象化身，值得我們進行文本的細讀。

黃因明是北京人，十六、七歲時跟著哥嫂黃教員夫婦來至成都，做了梅行素的鄰居。成都時期的黃因明舉動頑皮、天真爛漫，但梅行素還是發現了「她那雙陰沉沉的眼睛飽含了中年人的經驗」。（茅盾，1984a：73）黃因明與黃教員並不是親兄妹，二人之間的曖昧關係造成了黃夫人極大的痛苦。梅行素對黃因明的初印象不好，理由就在於她看不透黃因明，不理解她將自己陷入一段混亂的三角關係究竟有何意義，而梅行素之所以稱其為「野貓」，也是覺得黃因明的思想、人格、行為都太不可解。

待她二人在上海重逢，小說刻意描寫此時梅行素眼中的黃因明仍是「一張野貓似的面孔」、「兩隻陰沉沉的眼睛」，唯一與過去不同的是她眼中閃動著熱情的光。（茅盾，1984a：196）此時的黃因明已加入左翼陣營，出於職業性的警覺，輕易不能洩漏身份，在交談中總是顧左右而言他，遂給梅行素留下了更加神秘莫測的印象。對此，黃因明解釋稱，「關於別人的或是和別人有關係的，我也不能對第三者公開」。（茅盾，1984a：198）黃因明所謂的「別人」，即其投身的革命集體，昔日的友人梅行素則成了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對革命事業一無所知的梅行素自然摸不著頭腦，她只能將這種似曾相識的局外之感，與過去遭派系小團體排擠的經歷相連結，疑心對方是看輕自己，甚至是防賊似的防著自己。與此同時，一種不可抗力又令梅行素渴望與黃因明親近，向來獨來獨往慣了的她甚至主動提出想搬去與黃因明同住，眼見對方遲遲不肯答應，梅行素竟然再三地懇求。如此渴求的態度令梅行素自己也很奇怪，這一股讓她低聲下氣的「不可抗的力」究竟是什麼？

梁剛夫是梅行素在召開於上海的全國學聯會上認識的四川同鄉。梅行素對梁剛夫的印象是古怪的幽靈一般的人物，猜不透他的性情、思想、行動以及那「不可捉摸的冷靜」。（茅盾，1984a：190）多少人想要和梅行素接觸，但梁剛夫似乎十分忙碌，有時只能撥出十分鐘與梅行素淺談；而梅行素總是試圖引起活潑的談話，梁剛夫卻從不按照她所預想的套路回答，這使受慣了他人注意的梅行素感到難堪。

為什麼梁剛夫在梅行素看來是「幽靈」一般的人物？小說描繪梁剛夫的住所充滿了鬼氣，尤其在夜裡，忽然一陣風來使得桌上的火油燈衝起了極大的火焰，

然後跌倒似的往下一沉，就滅了。梅行素在這樣的環境裡「毫無理由地起了恐怖」，這所古怪的房子不能不使她更多幾分神秘的疑忌；而梁剛夫本人背著光，雖然「看不見他臉上的氣色」，但梅行素確定自己正受著他「冷峭的凝視」，而她照舊猜不透這眼光所暗藏的意義。（茅盾，1984a：189-190）

值得深思的是，到底為什麼梅行素總是猜不透黃因明、梁剛夫的心思？換言之，為什麼她就能看透黃夫人、陳女士、文太太、小學教員們？他們是一群將心思都寫在臉上的人嗎？還是簡單到一眼望穿？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扣問：梅行素真的如她自己所說，完全讀懂了那些男男女女嗎？好比梅行素自認為看透了上海這座城市，看穿了上海人唯利是圖的市儈本質，把握住了只有拜金主義這一項內容的上海文化；而在梁剛夫看來，梅行素對於上海的理解太浮於表面，甚至以此推斷她對任何環境的複雜性都不曾有過深刻的認識，所以總是呈現出一種「迷路」的狀態。（茅盾，1984a：191）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黃因明、梁剛夫的所謂深不可測，理解為一套與梅行素截然不同的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方法。梅行素之所以受到莫名的吸引，恰恰是因為這一套左派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有具體的鬥爭對象與革命目標，而迷路者最渴望的就是清晰的路線與明確的方向。

一般認為，梅行素是愛上了梁剛夫，才對革命發生興趣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這一說法與小說中李無忌這一角色的觀點不謀而合。李無忌認為，左翼革命黨人無非是一些拿了盧布卻躲在洋房裡快活的政治投機者，他們特別會用笑眯眯的怪可愛的臉去誘惑女子，編織愛情的網來利用女子，因為：「女子是沒有定見的，愛人是什麼，她也變成了什麼」。（茅盾，1984a：215）實則，梁剛夫是以冷淡漠然的態度引起了梅行素的關注，甚至喚起了她久違的對異性的尊重，因為他是難得不對自己有所企圖的男子。梅行素也並非亦步亦趨的戀愛至上主義者，否則她早該受初戀韋玉的影響，成為一個優柔寡斷的妥協派。梅行素內心對於梁剛夫的「久蜚的愛戀」被觸發的契機，是在梁剛夫向她拋來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社會問題的大哉問之後，期間他還反駁了她對於民族國家之未來發展的粗淺認識，提出要介紹她幾本革命理論的入門書籍。梅行素便是在如此情境之下，更加確定了自己對梁剛夫的情意，不僅她自己分不清究竟那股不可抗的吸引力是來自革命還是革命者，小說也從未過多闡述黃、梁的意識形態及其服膺的思想主義，或許

這也是《虹》所未完成之處，卻意外地在梅行素包括讀者心目中造就了一種野貓與幽靈式的氤氳氣氛。

野貓與幽靈，不僅是梅行素對黃、梁二人的神秘印象，所謂「你們有秘密，我要來窺探」，同時也象徵著梅行素面對左翼革命運動的內心起伏；其次，還是關於萬千無產者與共產主義再明顯不過的寓言，他們像野貓一樣居無定所，來去無蹤，似幽靈一般遊蕩在上海這座資本高度集中的大都會上空；此外，更象徵著黃、梁等人的革命哲學，社會如同野貓一樣是活的，時時刻刻在變動，社會與革命事業都不是站在空白的歷史的一頁裡，有無數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幽靈般的力量在四周圍牽扯，彼此影響。

小說的情節收束於一場以失敗告終的革命遊行，梅行素被驅趕示威人群的水柱擊倒而狼狽不堪，遂答應了作為愛慕者的軍官徐自強的邀請，坐在他酒店房間裡「軟軟的沙發」上喝著白蘭地驅寒，換上了他準備的「法國軟緞」旗袍。（茅盾，1984a：265-266）雖然二人話不投機且很快分道揚鑣，梅行素幸運地憑藉著這身高級服飾而在風聲鶴唳的警戒街頭蒙混過關。當武裝的巡捕「在梅女士身上打量了一眼以後」，粗暴卻也果斷放她離開，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安排那位巡捕喝令梅行素往「左邊走」，這一明顯的「左轉」指向賦予了這一稍顯倉促的小說結尾以開放性的複雜意涵。此時的梅行素已然確立了梁剛夫、黃因明式的革命意識方向，然而又外在地披掛著來自對立陣營所贈予的軟性時裝，以一種典型的摩登女郎形象重返抗爭街頭。這一「形右實左」（或曰外右內左）的形象，與其說是反映出梅行素的轉向如小說原計劃般的未完成，不如說它象徵了左翼青年在現實的政治高壓下對於道路的選擇所產生的內在矛盾性，即華服所代表的背離革命理想的生活方式，實質上卻能有效掩飾其危險的左傾身份從而換取革命的生機，而梅行素思想上的稚嫩與脆弱恰如她被水柱擊垮的嬌軀，近乎本能地在沙發與洋酒的軟性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五、結語

五四新女性梅行素，從林敦夫人這一戲劇人物身上，意識到女子必須撞破貞

操觀念的歷史規訓，才能對外衝出一條精神的出路。但在現實與理想的兩難中，她也逐漸體會到「性」是如何以女性原罪的身分有效地牽制著自己。不論是對易卜生的劇作《娜拉》還是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一文，梅行素都不是從一種綜合政治、經濟、歷史等全知全能的角度出發，而是有針對性地從這些文本中讀出了與自身煩難相似的處境，發見了女性同難者的存在。因此，只有將梅行素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不同觀點串連起來察看，才能夠理解小說在人物設計上的複雜性。

梅行素的成長故事，換一個角度看，也是一個不徹底的人物逐步認識到自身侷限的過程。在與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交往過程中，梅行素時時恐懼著「群眾」對「個人」壓迫和暴力，但也始終期待著能夠得到他人的理解，渴望覓得真正的同志。小說雖然描寫了不少陳腐保守的女性人物來反襯梅行素的進步思想，但並未將這些女性扁平化為簡單的反面教材，而是藉由梅行素與她們的交往，使她在群體之鏡中照見了自身的隱秘角落，進一步理解了個人與群體之間既有矛盾也有依附性的辯證關係，為梅行素將來真正投身並體認革命打下基礎。

徵引書目

（一）專書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易卜生著、潘家洵譯：《易卜生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茅盾：《茅盾全集（小說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五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茅盾：《茅盾全集（散文四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茅盾：《茅盾全集》第35卷（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收入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頁215-221。

陳建華：〈「時代女性」、歷史意識與「革命」小說的開啓形式：茅盾早期小說《虹》讀解〉，收入徐志偉、張永峰編：《「左翼文學」研究讀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35-260。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二）期刊論文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6期（1918年6月），頁489-507。

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第1期（1918年7月），頁5-14。

胡適：〈遊戲的喜劇：終身大事〉，《新青年》第3期（1919年3月），頁311-319。

唐俟：〈我之節烈觀〉，《新青年》第2期（1918年8月），頁92-101。

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6期（2008年12月），頁29-92。
（DOI:10.6352/mhwomen.200812.0029）

微明：〈《娜拉》的糾紛〉，《漫畫生活》第7期（1935年3月），頁5。

與謝野晶子著、周作人譯：〈貞操論〉，《新青年》第5期（1918年5月），頁386-394。

蘇敏逸：〈「個人」作為「革命歷史」的象徵：論茅盾的《虹》〉，《華文文學》第6期（2006年6月），頁17-27。

Uma Narayan, *Essence of culture and a sense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vol. 13, no. 2, Apr. 1998), pp. 86-106.

The Sexual Morality of Women and Its Counterparts: Alternative Narratives of Nora's Dilemma in Mao Dun's *Rainbow*

Shao, Yue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29, Mao Dun created the novel *Rainbow*, which narrates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female protagonist, Mei Xingsu, through education, marriage, work, and revolution. Mei Xingsu's early portrayal is often seen as a typical individualist, and criticism arises regarding the lack of clarity in her later shift towards left-wing revolution.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Mei Xingsu's understanding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piritual dilemma of the New Woman o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It delves into two texts tha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Mei Xingsu: Ibsen's play *Nora* and Yosano Akiko's "*On Chastity*". Through this explor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Mei Xingsu navigates the spiritual challenges of the New Woman.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Mei Xingsu's interactions with various female characters and revolutionary figures. It aims to illustrate Mei Xingsu's lengthy and complex journey from an individual to a collective mindset.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Mei Xingsu's turn towards the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is not a result of impulsive passion, but a spiritual pathway chosen after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er true dilemma.

Keywords: Mao Dun, *Rainbow*, Nora, chastity, Left-wing Literature